

《路標》與二十世紀初的 俄國思想

• 朱建剛

在二十世紀俄國思想史上，《路標》(Вехи)無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這本出版於1909年的薄薄小冊子，僅一年內就重版五次，其所引起的爭論直至20年代中期尚餘音不絕，更勿論它對俄國知識界內在的深遠影響。西方研究者曾斷言，若《路標》早面世幾年，它本可以改變二十世紀俄羅斯的歷史命運^①。此言雖有誇張之處，但足見《路標》之歷史意義。蘇聯解體前後，出於對民族傳統價值理念的尋找，《路標》又作為現代俄羅斯人精神上的指導受到推崇，得以多次重版。對於我國學術界來說，《路標》這個詞主要來自於列寧的〈論路標〉、〈路標派和民族主義〉等文章，而在很長時間裏對原著卻知之甚少，真正對於原文的譯介還是近幾年的事情^②。期間有學者偶有提及，但談不上系統的研究。自列寧以降，對《路標》研究大多集中於其外部政治意義，其內在精神意義則言之甚少，本文欲通過對《路標》背景及文本分析，闡明其在文化史上的轉折性意義，並從中揭示出俄國知識階層由此發生的命運轉折。

借用列寧評價高爾基(Maksim Gorky)《母親》(Мать)的話，《路標》同

樣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一本必需的書」。假如我們考慮到二十世紀之初俄羅斯所面臨的根本轉變，那麼上述評語《路標》是當之無愧的。在知識份子多年的宣傳鼓動之後，擺脫沙皇統治，使俄國成為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國家，已成為當時社會的共識。正如大臣會議主席維特伯爵(S. IV. Vitte)在回憶錄裏說的：「當時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數人，都像發瘋似地要求徹底改革俄羅斯帝國，實行極端民主的人民代表制原則。」^③然而，世紀初的俄國現實並未展現出如後世史家所言「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農奴制改革後半個世紀以來，沙俄經濟雖因改革不徹底而有所制約，但仍借西歐工業革命之東風取得了較大發展。從1887-1912年，俄國生鐵產量增長了612%，佔世界第五位；石油產量在1899年佔世界第一位；農業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出身於俄國農民的資產階級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進一步萌發了政治野心。文化上，托爾斯泰(Leo Tolstoy)、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巨著，列賓(Ilya Repin)的繪畫，烏蘭諾娃(G. Ulanova)的舞蹈，夏里亞賓(A. Scriabin)的歌唱等諸多

《路標》這本1909年出版的小冊子，僅一年內就重版五次，其所引起的爭論直至20年代中期尚餘音不絕。西方研究者曾斷言，若《路標》早面世幾年，本可以改變二十世紀俄羅斯的歷史命運。此言雖然誇張，但足見其影響力。蘇聯解體前後，《路標》又作為現代俄羅斯人精神上的指導受到推崇，多次重版。

經典使俄國在文化方面有資格與西歐並駕齊驅。在政治上，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自1894年上台之後儘管無所作為，但在廣大人民心目中仍然是國家唯一權威、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正如有人後來概括說④：

在俄羅斯，當時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的歷史地形成的政府，但它已經不能單獨掌權；另一種是對許多問題都有正確理解並充滿各種美好打算的社會，但它甚麼都不會管理，甚至不會管理自己。對俄羅斯的拯救在於這兩種力量的和解和聯盟，在於它們共同而協調一致地工作。

總而言之，1905年之前的俄國面臨的不僅是一個世紀的開端，更是一種新的希望、新的選擇和新的命運開始。

歷史往往充滿偶然，1905年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總演習」拉開了二十世紀俄國的歷史帷幕，其失敗則徹底粉碎了俄國現代化的和平之夢。列寧曾如此描述革命之起源⑤：

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信仰上帝，忠於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甫的率領下，從城市各個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區，前往冬宮前的廣場，以便向沙皇呈遞請願書。工人們舉着聖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領袖加邦已經上書沙皇，保證他的安全，請求他出來接見人民。軍隊調來了，輕騎兵和哥薩克揮舞軍刀撲向人群，開槍掃射跪下來央求哥薩克放他們過去見沙皇的手無寸鐵的工人。根據警察局的報告，當場死了1,000多人，傷了2,000多人。工人的憤怒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悲劇就這樣發生了，隨後發生的事件更具戲劇性。沙皇基於社會壓力發布十月宣言，提出成立杜馬、限制君主權力等一系列改良措施。不久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上台，以武力解散第一、第二屆國家杜馬。當局的背信棄義及血腥手段令其在人民中威信大跌，沙皇老爹再也不是人民心中的慈父；被鎮壓之後的工人階級元氣大傷，知識階層在「斯托雷平領帶」(即絞刑架)的壓迫下轉入沉默。眾所盼望的「兩種力量」非但沒有「和解和聯盟」，反而兵刃相見，最終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專制得以強化，進步力量卻被削弱，現代化之路更添阻力。

對於這種全民族的悲劇，當局自然把責任都推到與之對立的社會方面，其鎮壓矛頭針對向來為民眾代言人的知識階層(斯托雷平將之定性為「一場知識階層的革命」)。對於後者來說，它不但需要回答最急迫的問題：革命失敗之後怎麼辦？還要反思：革命為甚麼會失敗？知識階層何過之有？因此《路標》的論述重點也是側重下列兩個方面：其一、知識階層(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的精神危機由何而來(誰之罪？)；其二、試圖指出俄國知識階層此後的努力方向(怎麼辦？)。

《路標》共有七篇文章，其寫作契機雖源於1905年革命，但諸文重點卻是由今及古、由泛入微，由哲學到政治、經濟、法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十九世紀知識階層革命的成敗得失。文集副標題為《關於俄國知識份子的論文集》，列寧在〈論路標〉中認為⑥：

他們所說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指整個俄國民主派和整個俄國解放運動的思想上的領袖、鼓舞者和代表。

1905年失敗的革命，被斯托雷平定性為「一場知識階層的革命」。知識階層需要回答最急迫的問題是革命失敗之後怎麼辦？知識階層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的精神危機由何而來(誰之罪？)。《路標》七篇文章的重點是由今及古、由泛入微，由哲學到政治、經濟、法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十九世紀知識階層革命的成敗得失。

《路標》反對以別林斯基等為首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但把巴枯寧等人列為第一個知識份子，其目的在於要和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知識份子劃清界限。這一舉動本身就暗示着路標派對革命運動的告別和對文化事業的重視。整體而言，它是一本自我批判的書，面向最廣泛意義上的俄國知識階層。

列寧說得不錯，但他把《路標》這一舉動僅僅看作是對革命運動的背離和攻擊，未免失之偏頗。《路標》的確反對以別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等為首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但它之所以把巴枯寧 (Mikhail Bakunin) 等人列為第一個知識份子，又把幾乎所有的文學家、哲學家等人從知識階層這一概念中剝離出來，其目的卻是在於要和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知識份子劃清界限。這一舉動本身就暗示着路標派對革命運動的告別和對文化事業的重視。按照今天的理解，不但《路標》談論的，是俄國知識份子，就是路標派本身也顯然是典型的俄國知識份子。從文集談論的對象看，它幾乎涵蓋了當時俄國所有有教養階層。如別爾嘉耶夫 (Nicolai Berdyaev) 論俄國哲學的特點時所涉及的不僅有別林斯基等人，還有索洛維約夫 (Vladimir Solov'ev)、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等為其所肯定的知識份子。伊茲戈耶夫 (Aleksandr Izgoev) 在〈關於青年知識份子〉一文中不僅談到那些革命知識份子，同樣也關注那些普通的知識份子，甚至那些尚未畢業的孩子。作者中如別爾嘉耶夫、斯圖盧威 (Pyotr Struve) 等本身就曾經是革命民主派的一份子，因此就整體而言，它是一本自我批判的書，所面向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俄國知識階層；也是一本尋求答案的書，所考慮的是整個俄國社會思想界的弊端與出路，既不限於某一特定階層或集團，也不僅僅是批判和反思。

對第一個問題，即1905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或俄國民族性悲劇的原因，「路標」諸人都一致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俄國知識階層自身，而不在於社會外界的環境等因素。其具體論述由哲學到宗教、再到現實政治、革命歷史等各有側重不同。別爾嘉耶夫和布

爾加科夫 (Sergei N. Bulgakov) 主要從知識階層的世界觀基礎出發，剖析了其「真理觀」和「英雄觀」的實質。在西方傳統中，真理是永恆的，它一般不直接為社會現實鬥爭服務。但對俄國知識階層來說，所謂「真理」便是能幫助他們解決思想困惑並能付諸鬥爭實踐的學說。這一出發點不但「否定了哲學的獨立意義，使之從屬於某種社會功利性目的」^⑦，而且使得「在俄羅斯知識階層的感覺和意識中，分配和均等的利益總是凌駕於生產和創造的利益之上」(頁25)。知識階層言必稱西歐，外來思想乃至二、三流哲學家的見解皆被奉為主臬，而對本國如恰達耶夫 (Petr Chaadaev)、索洛維約夫等哲學天才，則因不符合鬥爭需要而束之高閣。真理被分為有益或有害，長此以往，「這條道路將引起社會公眾意識的瓦解，而後者又與人類尊嚴及其文化發展相關。」(頁31)

知識階層與基督教的英雄觀兩者貌似相近，都以自我犧牲為代價，換取民眾之幸福，但本質上卻截然不同。前者富於激情，滿懷道德使命感，要求全盤改造現實，「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巴枯寧語)，在一片廢墟之上造出一個新天地。「英雄事業最大的可能性、瘋狂的『情緒高昂』、極度狂熱、對鬥爭的陶醉、某種英雄冒險主義整體氛圍的營造——這一切都是英雄主義固有的習性。」(頁60) 而基督教的英雄則「注意力中心轉向自身和自身的責任；從未被承認的世界救贖者虛假的自我感覺中解脫出來」(頁65)。他們看似平凡，實則偉大；看似順從，實則堅定；看似輕易，實則艱難。在布爾加科夫看來，知識階層所謂的大事，「儘管完成起來非常困難，因為這需要克服對生命的眷戀以及恐懼這兩種最強烈的本能；但又特

別簡單，因為這只要相對短時間內的頑強努力，而這一事業暗示或期待的成果又是如此重大。」(頁59-60) 如此看來，知識階層的這種行為究竟是勇於獻身、捨生取義的英雄主義還是不願務實、但願做秀的逃避行為尚值得商榷。由此不妨聯想1905年革命時各民主黨派與政府談判時的那種激進強硬態度。維特事後不無遺憾地說^②：

應當說，不論皇帝，特別是整個宮廷集團和貴族對這條出路(指改良立憲之路——引者註)多麼不感興趣，但如果文化階級表現出明智的態度，當即割掉自己身上的革命尾巴的話，那麼尼古拉二世是會實現10月17日許下的諾言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文化階級未能順應由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國務經驗造成的形勢。

這自然是事後的一家之言，未必能印證當時的真實情況，但至少也指出了事態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格爾申宗(M. Gershenzon)認為：「知識階層中的社會觀點如此強烈，以至於使人斷然相信：生活中所有的負擔都源於政治原因，一旦摧毀了警察政體，健康、生機與自由便會立刻降臨。」(頁101) 而事實是，革命不僅需要摧毀和破壞，還需要足夠的耐心進行民眾的啟蒙，需要「創造性的自我意識」來完善自身。斯圖盧威認為，知識階層過於着迷於革命，而忽視了社會改良的機會，從而造成俄國社會今日的退化。歷史恰恰證明，凡革命者，雖初則轟轟烈烈，但最終極少成功，無論是早期的拉辛起義，還是十二月黨人的廣場起義，乃至不久前的革命；而改良者，從彼得大帝改革，到1861年廢除農奴制，及斯托雷平改革，儘管中間不無阻礙，或有不徹底之處，但終究成效昭著，推動了

俄國社會的進步。弗蘭克(S. Frank)提出：「**虛無主義的道德主義**(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引者註)是俄國知識份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點。」(頁160) 知識階層口口聲聲以人民利益為至上目的，但又將否定一切(包括具體的個人利益)作為絕對手段。這種目的與手段的矛盾組合正體現了其信念的邏輯混亂。女作家巴納耶娃(A. Panaeva)曾回憶：別林斯基去世後，其友人為撫恤其家屬而購買其藏書。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動情之餘承諾，一旦得到遺產便將一個有250名農奴的村子贈送給死者的女兒。眾皆為之動容，惟巴納耶娃說，即使具有如此人道的目的，用活人來作為贈禮也是一種頗值得懷疑的人道行為。基斯嘉柯夫斯基(B. Kistyakovsky)與伊茲戈耶夫亦見仁見智，指出知識階層法律意識之缺乏以及對青年後輩教育的失敗。儘管諸人所提觀點可圈可點，但確實道出了知識階層某些值得深思的弊病，為打破知識階層的自我崇拜首開先河。

對於該怎麼辦的問題，《路標》同仁一致強調知識階層必須改變，「在歷史的當下時刻，知識份子所需的並非是自我張揚，而是自我批判。」(別爾嘉耶夫，頁29)「知識階層需要改正自身，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只有當他取得自由的、無形但真實的思想成就時才能做到。」(布爾加科夫，頁64) 各人對如何改變的問題各抒己見：別爾嘉耶夫認為出路在於宗教哲學；弗蘭克——宗教人道主義；基斯嘉柯夫斯基——真正的法律觀念；等等。其主張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點。首先，知識份子必須改造自我，如格爾申宗說的：知識階層自身首先要成為「一個人」，應擺脫政治的束縛，轉入內在的自我完善。這涉及到知識階層自身建設問題。知識階層一

俄國知識階層口口聲聲以人民利益為至上目的，但又將否定一切作為絕對手段。這種矛盾正體現了其信念的邏輯混亂。《路標》同仁強調「在歷史的當下時刻，知識份子所需的並非是自我張揚，而是自我批判。」「知識階層需要改正自身，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只有當他取得自由的、無形但真實的思想成就時才能做到。」

斯托雷平曾說：「諸如《路標》之類文集的出現，在那個名為俄國知識階層的獨特精神王國裏是一種暴動和大膽的革命行為。」直到二十世紀80年代，《路標》仍在前蘇聯長期被禁，作為「資產階級—貴族反動派在俄國革命背景下的意識形態」遭到批判。「路標」之遭遇堪為二十世紀俄國知識階層之縮影。

味從西方輸入各種學說包括馬、恩的階級學說來武裝自己，發動工人階級，但卻沒有為本階層找到一種合法存在的學說，它似乎只能依附於某個階級，不是農民便是工人。因此，所謂改造自我，不僅是針對個人，不僅要拋棄原先暴力革命的思潮，而且也是確立本階層社會地位的一種嘗試。俄國文學史家、思想家伊凡諾夫—拉祖姆尼克(R. V. Ivanov-Razumnik)於1911年出版的兩卷本《俄國社會思想史》就是這種嘗試的體現。該書開篇便提出：「何為俄國知識階層？」隨即提出：「知識階層首先是固定的社會集團。」「其特徵是創造新形式和新思想並積極把它們貫穿到生活中去，從而達到每一個性在物質和精神上、社會和個人上的解放。」^⑩其次，別爾嘉耶夫等人多次提到了文化的「生產和創造」問題，知識階層不能再一味從西方或傳統中為今天的俄國發掘思想武器，俄國需要創造，需要全新的俄羅斯思想。這對於百年來一味借鑑西方理論(西歐派)或依賴傳統(斯拉夫派)的俄國思想界來說，無疑有振聾發聵之效。其三，在和民眾關係上，布爾加科夫認為知識階層必須「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放下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派頭，切實為民眾做些事情。在這一點上面，路標其實繼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傳統，後者在1880年紀念普希金大會上就號召俄國知識份子：「屈服吧，驕傲的人，首先打掉自己的傲氣。屈服吧，無所事事的人，首先在故土上耕耘。」^⑪然而，思想文化上的轉型並非易事，更非幾篇文章即能奏效，《路標》用心良苦卻收效甚微，反而在國內被禁數十年，「路標」之遭遇亦堪為二十世紀俄國知識階層之縮影。

長期以來，《路標》被前蘇聯和我國主流思潮視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思想保守甚至反動的見證，直到二十世

紀80年代尚被作為「資產階級—貴族反動派在俄國革命背景下的意識形態」^⑫遭到批判。但今日再議《路標》，我們會發現它充滿了精神上的革命性。首先，《路標》對於流行近百年的革命思潮說不，這在當時政治上沙皇統治黑暗、馬克思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固然有為當局辯護之嫌，但從中亦充分體現了知識階層獨立思考之特性，是知識階層自身成熟的標誌(俄羅斯學者將《路標》定義為「知識階層自身定位的一種嘗試」^⑬)。其次，《路標》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對當時作為革命動力的知識階層說「不」，提出重新反思知識階層的主張，這顯然是要打破知識階層作為民眾導師的偶像崇拜，這等自我批判的勇氣何嘗不是知識階層精神上一次意義深遠的革命呢？難怪斯托雷平說：「諸如《路標》之類文集的出現，在那個名為俄國知識階層的獨特精神王國裏是一種暴動和大膽的革命行為。它的革命力量直指那導致無數人犧牲的、名為政治的偶像統治。」^⑭再次，《路標》提出知識階層應該努力的方向：回歸知識階層自身崗位，致力於文化建設。對大部分俄國知識份子來說，《路標》所帶來的心靈衝擊是無法估量的。雖說他們並沒有立即接受其文化轉向的呼籲，但數年之後，知識份子逐漸開始注重平凡但有效的日常工作，由此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文藝復興」。此刻，雖然還有列寧等人在海外堅持鬥爭，但就總體形勢而言似難成大氣。列寧自己也說：「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⑮可見當時革命形勢之無望。若非突然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俄國捲入其中，導致俄國國力大衰，國內矛盾激化，二十世紀之俄國面貌將會怎樣，實難預料。戰爭的偶然性卻又釀成了知識階層的悲劇命運。因為已經告別革命的他們，

對於突如其來的革命根本沒有絲毫的準備。長期的書齋生活使其根本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政治鬥爭。最後的命運只能是別爾嘉耶夫所說的^⑤：

俄國革命同樣是俄國知識份子的終結。革命永遠是不知感恩的，俄國革命對俄國知識份子特別不知感恩，知識份子曾為它作了準備，而它卻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把他們拋入深淵，它將所有古老的俄國文化（實質上俄國文化一直是反對俄國歷史上的政權的）打入深淵。

自問世以來，《路標》因其觀點激進而遭到各派人士群起而攻之，僅別雷（Andrei Bely）等少數人看到了它積極的一面，即它對精神財富的珍惜，對藝術創造的推崇。當八年之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全國陷於一片破壞大潮中的時候，《路標》的這一潛在意義才愈發明顯。以別爾嘉耶夫等又一批知識份子發表了論文集《來自深處：對俄國革命的思考》（*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作為對《路標》傳統的一種延續和回應。高爾基也在《新生活報》（*Новая Жизнь*）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不合時宜的思想」，懇請新政權對文化多加重視。可惜在那炮火連天的歲月中，偌大俄羅斯已無幾人考慮至此，抑或有之，亦屬有心無力者。

歷史總是驚人地重複。隨着1991年蘇聯紅旗落地，俄羅斯在跌跌撞撞中實現了民主化，然而意識形態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似乎並未給知識份子帶來多麼有利的發展契機。大眾忙於每日生計，無暇聆聽知識份子的教誨，革命主動和知識份子告別了，知識份子再度陷入一個世紀前的失落。在這種情況下，古老的《路標》煥發出新的光輝，有關它的書籍年年不斷。

自1991年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和真理出版社各自推出《路標》之後，1992年俄羅斯書籍出版社也出版名為《道路的探索：俄國知識階層與俄國命運》（*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一書，內收《路標》和《路標轉換》（*Смена Вехи*）兩部文集。1993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知識階層·權力·人民：文選》（*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ласть. Народ: Антология*）一書，內收《路標》四篇文章；1994、1996年，俄國科學院哲學所接連推出了兩部關於《路標》的論著：《俄羅斯精神之無限可能性》（*Невостребова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а*）和《知識階層與宗教：對「路標」的歷史反思》（*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лигия: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Вехи”*）^⑥。1998年12月，在《路標》誕生九十周年之際，俄國學術界在葉卡捷琳堡召開大型會議，並出版《二十世紀歷史中的俄國知識份子：無法結束的爭論——紀念「路標」出版九十周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оссии в истории XX века: неоконченные споры [к 90-летию сборника “Вехи”]*）論文集，共收論文150多篇，足見路標意義之大，影響之深。對此，法學博士伊薩耶夫（I. Isaev）總結說^⑦：

不管看來多麼荒謬，我們今天在走了那麼多彎路之後又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為了今後不再「選錯道路」，顯然有必要回顧我們的前人（指路標派——引者註）在這個領域內是如何處理的，他們絕不比我們愚蠢。相反，正如生活所證實的，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真正的預言家。即使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找不到當今問題的現成解決方案，但至少我們將避免一次次地重複相同的錯誤。

1998年俄國學術界召開大型會議，並出版《二十世紀歷史中的俄國知識份子》一書。該論文集收論文150多篇，足見路標影響之深。伊薩耶夫總結：「不管看來多麼荒謬，我們在走了那麼多彎路之後又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即使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找不到當今問題的現成解決方案，但至少我們將避免一次次地重複相同的錯誤。」

早在《路標》第一版序言中格爾申宗就說：「我們並不裁判過去，因為我們清楚它的歷史必然性，但我們要指出，迄今社會所走的道路，必將其帶入毫無出路的死胡同。……或許，現在，被巨大的動盪所震撼後，他們會多聽聽那微弱的聲音。」

事實上《路標》的意義，格爾申宗早就在第一版序言中說明：「我們並不裁判過去，因為我們清楚它的歷史必然性，但我們要指出，迄今社會所走的道路，必將其帶入毫無出路的死胡同。我們的警告並不新鮮：從恰達耶夫到索洛維約夫和托爾斯泰，所有我們這些深邃的思想家都不斷地強調過。但沒人願聽，知識階層不顧其而前行。或許，現在，被巨大的動盪所震撼後，他們會多聽聽那微弱的聲音。」(頁23)近百年之後，我們卻發現，那原本「微弱的聲音」原來卻是歷史的警鐘，在我們今天這個日益浮躁的社會中不斷回響。

註釋

① Christopher Read,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1900-1912: The Vekhi Debate and It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179-80.

② 基斯嘉柯夫斯基(B. A. Kistiakovskii)等著，彭甄、曾予平譯：《路標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③ 維特(S. IV. Vitte)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273。

④ 轉引自洛斯基(N. O. Losskii)著，雷澤林等譯：《俄國哲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220。

⑤ 《列寧全集》，第28卷(1916年7月至1917年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313。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列寧論文學與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72。

⑦ И. А. Исаева, *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2), 24. 文中以下凡引此書，只註頁碼。

⑧ 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續集)——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頁297。

⑨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у,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и мещ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жизни XIX в.* (С-Петербург, 1911), 4, 12.

⑩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馮增義、徐振亞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頁273。

⑪ В. Н. Дуденк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Веховства И Модернизм: Критика антигуманизма и эсте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рубежа XX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4), 3.

⑫⑬ Отв. ред. В. Б. Власова, *Невысказа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а* (Москва: РАН. Ин-т философии, 1995), 16; 12.

⑭ 《列寧全集》，第28卷，頁333。

⑮ 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著，雷永生譯：《自我認識——思想自傳》(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頁224。

⑯ 見註⑩。該書收錄幾位哲學博士對《路標》文集與知識階層關係的論述，並附有別雷、斯托雷平等「路標」同時代人對《路標》的評論。該書主旨在於揭示二十世紀俄國知識階層傳統價值觀的命運，並深入分析了革命前夜知識階層意識的特徵及其向蘇聯時期轉變的特點。А. Н. Лазарев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лигия: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Вехи"* (Москва: РАН. Ин-т философии, 1996)，全書旨在論述知識階層的宗教特徵，及其在俄國背景下對自身使命的認識。作者在文中指出，俄國知識階層的這一認識恰恰是從《路標》開始的。

⑰ И. А. Исаева, *Пути Еврази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2), 3-4.

朱建剛 1975年生，蘇州人，文學博士。自1994年起分別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現任教於蘇州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俄國文學、俄國思想史。